

被分为南北两部分，但以军仍将允许平民从北部向南部撤离。然而，哈马斯在加沙的势力根深蒂固，该组织声称拥有至少四万名武装人员，并在加沙建造了错综复杂的地面工事与地下隧道网络，同时威胁将处决人质，因此通过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彻底驱逐在加沙的哈马斯武装难度较高。

尽管以色列发誓要彻底铲除哈马斯，但本轮冲突结束后加沙的政治安排走向仍不明朗。一是以色列不大可能恢复对加沙的长期全面占领。以色列在2005年决定单方面撤出加沙，正是由于其管理成本远高于安全收益，若再次占领该地，面对人口显著增长的加沙，以色列将面临比2005年以前更为严峻的形势。二是以色列不会放任杰哈德等其他巴勒斯坦武装派别控制加沙。若这些更激进的武装派别在以军行动结束后接替哈马斯控制加沙，以将再次陷入无法管控加沙安全威胁的境地。三是以色列曾设想由法塔赫来重新控制加沙，这其中暗

含以全面单独控制约旦河西岸的企图，但该计划可行性较低。法塔赫自2007年撤出加沙后，加沙民众对其支持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若其重返加沙也将面临种种困难，甚至可能引发混乱。11月6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巴以冲突结束后，以色列将“无限期地”对加沙地带承担“全面安全责任”，但并没有透露具体信息。

目前看来，以色列在加沙南部靠近埃及一侧建立大型“安全区”，把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尽量多地安置其中，并在北部或现有边界墙周边建立缓冲区的可能性较大。这种做法有利于以色列管控加沙的物资和人员进出。对加沙北部地区的“人口疏散”，也有利于以色列“清洗”巴勒斯坦人口，实现加沙的“非哈马斯化”，重建其安全结构。内塔尼亚胡政府只有通过一场获得前所未有收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本国安全保证，才能减轻以民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而

在加沙建立缓冲区或“安全区”就是一种可能的形式。10月18日，以外长科亨表示，本次行动结束后加沙的领土将会减少。以农业部长、前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迪希特也称，冲突结束后可围绕加沙边界设立缓冲区，阻止加沙民众靠近以边境。这也意味着，未来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或将进一步被压缩。

加沙问题根源于殖民主义遗产，又受阿以冲突、以色列长期封锁和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等多重因素共同催化。事实上，通过“两国方案”公平公正地解决巴以问题，才是结束加沙悲剧的根本出路，否则加沙地带难保不会再次成为风暴中心，以色列也难以获得其竭力追求的国家安全。而当务之急是促使更多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与医疗物资进入加沙，并敦促双方尽快实现停火止战，为通过政治手段迈向谈判和解决冲突创造基本条件。^[7]

（余国庆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陈瑶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此轮冲突难阻中东“和解潮”

文/丁 隆

本轮巴以冲突以异乎寻常的方式突然爆发，举世皆惊。这不仅因其事发突然，难觅先兆，还因此前中东地区仍整体沉浸在“大和解”带来的祥和氛围中，直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血雨

腥风让整个地区再次笼罩在动荡的阴影中。国际社会对这场冲突的忧虑并不局限于巴以，还在于冲突是否将外溢失控，危及中东安全，并使方兴未艾的地区“和解潮”按下停止键。

“亚伯拉罕进程”点燃火药桶

本轮冲突虽是巴以围绕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和宗教圣地被侵犯产生的矛盾不断升级所致，但更是巴方对中东地缘政治变局的回

应。近几个月，美国、沙特和以色列就沙以关系正常化举行三方谈判，并已接近达成协议。但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后的10月14日，据多家外媒报道，鉴于目前的巴以局势，沙特已暂停由美国推动的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也是巴勒斯坦事业的长期支持者，由其提出并于2002年在第14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作为阿拉伯版的“两国方案”，曾获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沙以若实现和解，本就出现边缘化趋势的巴勒斯坦问题将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可能被彻底埋葬。因此外界广泛认为， Hamas 在此敏感时间点发动大规模袭击，针对沙以和解谈判的意图明显。Hamas 虽然袭击的是以色列，却在向美国和沙特敲响警钟，该组织一向坚决反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认为这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事业。因此，冲突虽发生在巴以之间，但根源在地区变局。此番 Hamas 孤注一掷，不惜招致灭顶之灾，志在阻断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进程，将巴勒斯坦事业拉回地区与国际视野。

“亚伯拉罕进程”是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在对共同祖先——亚伯拉罕的认同上，超越宗教分歧，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这一框架下，2020

年8月，阿联酋率先宣布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巴林随后跟进。次月，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在美国白宫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宣布双方以实现宗教和解为宗旨，建立外交关系。随后，苏丹和摩洛哥也宣布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进程”由以色列首先提出，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成为美国实施中东战略收缩、重构中东盟友体系的重要步骤。为此，美国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纵容以色列采取挑衅巴勒斯坦等一系列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措施。部分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进程”，则是看重与以色列的经贸、科技与军事合作，期望联手美国和以色列抗衡伊朗。它们还将与以色列和解视为巩固与美国盟友关系的重要途径，试图在“石油换安全”为基础的阿美盟友关系动摇之时，为双方关系注入新内涵。

2021年，新上台的美国拜登政府继承了前任特朗普政府的巴以政策遗产，继续推动“亚伯拉罕进程”。为助力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拜登试图将促成沙以建交作为其重大外交成果，因此竭力拉拢沙特加入“亚伯拉罕进程”与以色列建交。与此同时，美国还拉拢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组成“中东四方机制”（I2U2）、“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等区

域经贸与安全合作机制，促进印度、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整合与利益交织，企图用经济利诱和建立军事联盟的手段，在中东拼凑“小院高墙”式区域联盟，以维持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制衡伊朗等地区敌手，在中东排挤中国和俄罗斯。

然而，“亚伯拉罕进程”的宗教和解外衣遮蔽了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根源性问题，酿成此次巴以间数十年来最血腥的冲突，这说明它描绘的中东和平图景只是海市蜃楼。

“和解潮”促进中东和平与发展

中东“和解潮”是指中东伊斯兰国家间关系出现全面缓和的浪潮。以今年3月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复交为高潮，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得到全面缓解，地区热点问题显著降温。近年来，中东“和解潮”沿着四条主线发展：一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内部实现和解。沙特、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与卡塔尔实现和解，结束了对后者自2017年断交后的封锁，海合会成员国长达五年的分裂也由此宣告结束；二是中东国家围绕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产生的矛盾得到缓解。自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及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异军突起，引发阿联酋、沙特等国的担忧，这些国家与土耳其、卡塔尔等亲穆兄



2023年10月18日，位于沙特吉达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执行委员会召开部长级特别会议，讨论巴以局势。

会国家爆发尖锐矛盾。但随着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国家退潮，双方对立程度减轻。三是沙特与伊朗今年3月在中国斡旋下实现和解，地区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阵营之间的冲突也得到缓和，并引发更多中东国家走向和解。四是叙利亚重返阿拉伯世界。在被阿拉伯国家孤立十余年后，今年5月叙利亚恢复在阿盟的成员国资格。

“和解潮”出现的内因是中东国家聚焦国内发展，主动改善外部环境，缓与地区敌手的关系。从外部看，中东“和解潮”的出现与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密切相关，中东国家认识到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意味着其弱化了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它们将独自承担本国安全责任，直面安全威

胁。这迫使它们因应美国中东政策调整，主动缓与地区对手的关系。而中国等和平力量积极劝和促谈则是中东“和解潮”出现的重要外因。

尽管有人将“亚伯拉罕进程”归为中东“和解潮”的一部分，然而，本轮巴以冲突表明，二者在动机、目标、影响等方面分野明显。不仅如此，“亚伯拉罕进程”还对中东“和解潮”带来冲击。

有限的冲击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战事不断升级、愈演愈烈，但除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对以方发动零星袭击外，当前冲突尚未外溢至中东其他地区，

这预示着其对中东总体安全局势与“和解潮”的发展影响较为有限。

首先，近些年巴以冲突已更加本地化，难以冲击中东和国际安全大势。“亚伯拉罕进程”的不断推进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的重要起因，同时也反映出巴勒斯坦事业在地区遭遇冷落的现实，这也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衰落的最新注脚。基于维护各主权国家利益的国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勃兴，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不再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核心关切。美国等域外大国也减少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企图用“亚伯拉罕进程”取代巴以和平进程。近些年，面对地区和国际新形势，巴以问题已在事实上降级为“巴勒斯坦的问题”，鲜有域外大国和地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直接卷入冲突。

与此同时，近些年地区“和解潮”的纵深发展期也恰逢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时期，这说明“和解潮”与巴以冲突彼此相对绝缘，各自遵循规律发展。本轮冲突虽规模大、烈度强，但与此前爆发的多轮巴以冲突相比并无太大本质区别。

其次，“和解潮”出现的根本动因是中东国家各自的发展战略调整。在大国挑拨下，中东国家曾长期陷入地缘政治对抗，付出惨重代价，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中东各国逐渐认识到发展

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紧迫性，纷纷推出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多元化，试图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这也促使它们将国家战略优先事项，由长期奉行的安全优先调整为发展优先，将“去安全化”作为地区战略的指导性原则，缓与地区对立国家的关系。这意味着中东国家的“求团结、谋发展”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为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一历史性趋势非一次巴以冲突所能改变。也因此，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国家普遍保持克制，谨慎行事，竭力避免卷入冲突。

再次，“亚伯拉罕进程”受阻或有利于地区“和解潮”延续。“亚伯拉罕进程”包含挑动地缘政治对抗的成分，意在使中东国家重蹈阵营对抗的覆辙，重陷安全困境的死穴。该进程的目标是建立“中东版北约”，美国通过撮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企图重构中东安

全格局，建立其领导下的中东盟友网络制衡伊朗，并通过“分而治之”维持对中东局势的掌控，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具体而言，“亚伯拉罕进程”意在使沙特与伊朗重陷安全困境，威胁本就脆弱的和解进程。为促成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承诺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沙特则同意增产石油，帮助美国平抑油价。同时，“亚伯拉罕进程”的“沙以篇章”还包括沙美正式建立安全同盟等内容，该同盟剑指伊朗，与沙伊和解形成的中东局势缓和之势背道而驰，若真达成或将使沙伊重陷对抗。本轮巴以冲突平息后，美国和以色列若将伊朗视为 Hamas 突袭以色列的幕后主使，加紧对伊朗的围堵与遏制，或将恶化中东安全环境，危及本就脆弱的中东“和解潮”。从长期看，本轮巴以冲突暂时打断“亚伯拉罕进程”后，沙特或将重新考虑加入该进程的得失。然

而，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沙以和解或仍是大势所趋，而这将为巴以和平进程与中东安全局势带来挑战。

美国推动与“两国方案”背道而驰的“亚伯拉罕进程”，偷换了中东和平的概念，旨在构建中东“伪和平”，包藏重新挑起中东地缘政治对抗的祸心。本轮巴以冲突规模与烈度空前，已造成逾万人死亡，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严重破坏此前“和解潮”促成的地区和平氛围。然而，从总体来看，“和解潮”由中东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渴望驱动，非巴以冲突所能阻断，该潮流还有望在外部和平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向纵深发展。本轮巴以冲突也证明，绕过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地区难以实现持久和平。只有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该地区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大和解。■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美国中东布局被打乱，各方分歧耐人寻味

文 / 吴冰冰

从整体来看，本轮巴以冲突背后的大国博弈出发点是巴以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各自的决策选择，核心是中东地缘战略格局中以色列、美国与伊朗的三方关系，而国际社会其他相关方对此次冲突做出的反应也耐人寻味。

改变策略的以色列

此次 Hamas 突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后者长期以来的“国家安全神话”，也意味着以色列国家安全“威慑原则”的阶段性的失败。长期以来，威慑一

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中占据核心位置。1953年，被称为“以色列国父”的以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在其制定的国防与安全概念文件中，就将威慑、早期预警和进攻能力作为国防原则的三大支柱。以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将以色